

新民晚报 星期天夜光杯 / 夜光杯

包粽子的女人

庞余亮

在我的散文《幸福路上的幸福》中，我写过幸福路上的两类女性：女屠夫和打烧饼的女人。这在我老家，不是很常见。平心而论，这两种职业的最佳从业者，的确应该属于男性。

余华的一本《活着》，2018年卖了280万册（不包括盗版）。为什么如此畅销？还不是这本小说写尽了我们的生活。

所以，职业的选择不完全是人的主动，而是生活的被动，就像“生活”这两个字，分为“生”和“活”。为了生，为了活，再多的重担压过来，谁管接这重担的是男性的肩膀还是女性的肩膀？

从幸福路搬到渔婆路上后，我就很少见到女屠夫和打烧饼的女人了。如果有空闲，去渔婆菜场临时客串采购员的话，会见到许多卖鱼的女人。相对于屠夫，卖鱼的力气要小很多。

包粽子的女人不在菜场上，而是在渔婆路边开一家小超市。

“门面房”的概念在我们这个城市很流行，但不是所有的“门面房”都能做大生意。最不济的方法就是开个小超市。渔婆路算是大路了，两边的小超市并不少。在大超市的挤压下，小超市拼的不是数量和质量，而拼的是服务时间。这个用上海一条著名马路命名的超市同样拼的是服务时间，有很多次深夜回家，总是见到这家小超市的灯还亮着。

第一次引起我注意的是，有天深夜里，小超市门口有个女人在转呼啦圈。穿红羊毛衫的中年女子像晃动的火团。这无疑是小超市的女老板了。呼啦啦呼啦啦地响，声音有点孤单，但那情境绝对有向上和不甘的暖意。

第二天，我特地去她的超市买了一瓶饮料，因为我说的是普通话，她也用普通话作答。可能是这个普通话，很多想问的话无法问出口，只好匆匆离开。

再一次被这个女老板吸引已是一年之后了。我准备去上海城，正好从她的小超市门口走过，惊讶地听到了音乐声。这个女老板一个人对着小电视跳广场舞。她跳得不错，但没有人加入她的队伍，连观众也只有我一个。当然我的头脑中冒出了一篇读过的小说《一个人张灯结彩》。她一个人张灯，一个人结彩，一个人守着她的小超市。不知道小超市的生意好不好，但有一点可以肯定，这小超市肯定用了自家的房子，否则连租金也租不起的。渔婆路上曾有家我常去的卖报纸和杂志的店铺，做了好多年了，他家的文学杂志非常全，而且很及时。由于房东涨租金，只好关了店。

生活一直向前，很多事情都发生了变化。小超市也悄悄发生了变化。前年春节，女老板在小超市的门口摆了个包粽子的铺板，还有高压锅。粽叶在她的手里灵活地跃动，很快就把那些白糯米“吞”到肚子里了。正在煮着的粽子发出的清香仿佛在提醒：端午快到了哇。

两年多了，她的包粽子成了主业，几乎是一年到头都有。生意做得很好，她还在小超市的北面开了家粽子店，店门口就是她种的月季花。

月季花开得好真好，端午真的快到了哇。

漫步，西天的霞光犹如恩远望之，像一场贞洁的法典，如山如河的壮阔。事，颇为壮观；透过笔直的水杉林观瞻晚霞，久了，隐隐一股药香直入肺腑。穹窿墨蓝，西天几波云彩，呈现大面积玫瑰红，好比视觉系统的宏大叙事，广阔无际，有置身海上的错觉，整个身心为一凛。

一个人，但凡心里装着远方，他的内心一定铺满晚霞的吧，是世间唯一的诗意以及不可多得的恩典。

飞机飞过去，高铁乘过去，不要“猫守拷”，不要日夜兼程，奇山异水不必面面俱到；慵懒地住住吃吃喝喝，还给自己美其名曰：休身也修身。

一开始我不太适应这种旅游态度，但是渐渐地似乎也快不起来，只有跟着慵懒了。前些日子去青田，三小时高铁到达。青田是十足的小城，沿瓯江五座桥，便是走通了青田。酒店距离火车站不过一刻钟的车程，所到景点也都很近，甚至散步过去也可以。石门洞，按照打卡式的旅游，半小时足够，但是我们看看谢灵运赋名石门洞的神韵和一代文宗刘白温祠堂，听听瀑布，山脚下鸢鹭等绿皮火车穿山洞，居然花了一个半小时。吃了晚饭，又在街上走走，喝杯咖啡。小城故事少，处处皆散漫。主人说，这是“快车慢游”的理念。这“快车慢游”也恰是休假享受的休了。

节是节，假是假。若是做拟人化的比喻，节和假蛮通达人情世故，常常联袂而行，这就是节假日了。

节是节，假是假

马尚龙

节是节，假是假。在长假时代，除了单位组织，我们都偷偷出去玩过。托人开个假，搭上星期天，玩两天，那一个年代大约都有过的。我曾经请了病假坐在卡车车厢里去杭州，也算是路道粗的。

一直到了1995年，才有了双休日，又过了12年，年假成为法律性制度，从此，有了一个新的说法：节假日。去旅游，再也不必托人去开病假单，更不必偷偷摸摸。

节的概念在变，假的内容也在变。刚刚开始有假期之初，当是穷尽度假日，疲劳山水中，将度假和休息做一个截然的区分。几年之后，度假向休假演变了。

初夏小事

钱红莉

这小小花朵，好比一把把羽扇，无风自摇，摇着摇着，夏天到了。小时，大人做好一把鹅毛扇，便会拿染料把雪白扇子染红半截。外婆把这染料叫作洋红。给小鸡雏的翅也染一点洋红。为了区别，有的人家染了石绿。满地跑的都是洋红石绿的小鸡雏……大风的日子，稻浪扬花之季，天比往日高一些，云是淡的，世间一切都是那么妥帖安宁。

初夏，一年中最好的日子，有风，阳光，蓝天，白云，飞鸟，所有的植物绿得幽深，连大树都是暗哑无言的绿色，这样的场景总叫人恍惚。

清晨的菜市水果摊，惹人驻足。杏子的香味，致人微醺；桃，红如《牡丹亭》，令人浮想翩翩；绿皮西瓜，散发着一种俊俏的香气，犹如童年复苏，一拳砸下，碎成几瓣，就那样连皮啃，瓜瓤中的籽实一齐吃下去了；杨梅，整箱长途运来，猪肝紫色，好像一个人脸色不好，永远在生气，我不太喜欢。最重要的，是应该吃点儿枇杷了，价格不菲。偏爱

节假日是三天两头都会有了的，于是也常常将节假日融为一体。尤其是大长假小长假，总是将一个节日化为一个假日，五天七天的休息，出门旅游热闹适度假去了。

忽而有人问我，你们年轻时候是怎么过节怎么度假的？知道那时候穷，不过穷也有穷白相的。

我说几十年前，我们只有过节，没有度假的，更没有旅游这个概念。我翻阅过资料，国家旅游局是在1982年设立的。当然，出门白相也是有过的。可能是单位组织的活动。

我印象很深的一次单位活动，是苏州一日行。某个夏日的星期天。清晨6点半集合发车——当年不管是什么游，总是一清早出门的，只有出发早，才能实际上拉长活动的时间。上海到苏州，七八十公里，现在高速开过去几个小时，那时候没有高速，也没有国道，只有公路。与公路匹配的是卡车、长途汽车、面包车、手扶拖拉机。到苏州，已经是十点多了。

如果仅仅是慢条斯理，倒也

去年是汪曾祺先生诞辰一百周年。汪老最出名的文字应该是谈吃的吧。《食事》里收录其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谈吃小文数十篇，若与其《随遇而安》一书一起阅读则更能得其真味，如同白斩鸡必配特制酱油一样。

汪老是高邮人，秦王嬴政于公元前223年在此筑高台、置邮亭，故名高邮。虽然他不喜欢人家一得知他是高邮人就和他讲起咸鸭蛋，似乎高邮只出咸鸭蛋一样。但是后者真的是高邮的“名片”。端午将近，又是写汪老谈吃的文章，首先应该谈谈咸鸭蛋。“我的家乡是水乡。出鸭。高邮大麻鸭是著名的鸭种。鸭多，鸭蛋也多”。汪老不喜袁子才但还是引用了《随园食单》有“腌蛋”一条而且“与有荣焉”。“腌蛋以高邮为佳，颜色红而油多，高文瑞公最喜食之。席间先夹取以敬客。放盘中，总宜切开带壳，黄白兼用；不可存黄去白，使味不全，油亦走散。”随园主人谈吃特为细致也就是考究。有人只吃咸蛋黄而蛋白弃之，真是“使味不全”。因为油足之佳品往往较咸，而咸蛋黄则较淡，若只吃蛋黄则无法品出咸蛋之味。同样的道理，我在生抽里往往加入较多香油，一取香油之香，二来降低生抽之咸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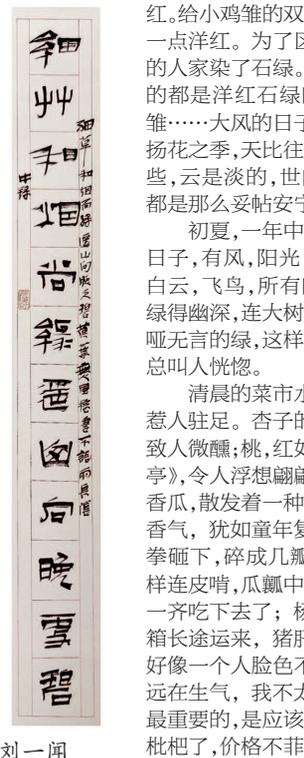
据说淮扬菜是我国国宴的主要风格，一来是淮扬菜较清淡温和比较适合各国贵宾的口味，二来也和周总理是淮安人有关。扬州是《尚书·禹贡》中九州之一，其中提到“淮海惟扬州”故有淮扬、维扬的称谓。汪老谈吃则少不了淮扬菜。“狮子头”是著名的淮扬菜，“猪肉瘦肥各半，爱吃肥的亦可肥七瘦三，要‘细切粗斩’”。汪老特别提到“绞肉机绞的肉末不行”。至今我家不论馄饨、百叶包、肉圆等肉馅儿都是父亲手切的绝不用绞肉机绞的肉末，而且是用刀背斩。上海的淮扬菜馆我吃的不少。南京西路有上海评弹团，周围有绿杨村、梅龙镇、新镇江等淮扬菜馆。一般中午吃好，下午二时去听书，还有扬州饭店、老半斋也吃过多次，其中“狮子头”几乎是必点的菜肴。汪老说“狮子头松而不散，入口即化”的要求，我吃过的这些名店还是能够达到的。他还提到周总理会做狮子头，“曾在重庆红岩八路军办事处做过一次，说：‘多年不做，来来来，尝尝！’想必做得很成功，因为语气中流露出得意”。

书中专门有“切脍”一则。孔子所谓“食不厌精，脍不厌细”。《东京梦华录》里有“临水斫脍，以荐芳樽，乃一时佳味也”。“脍”即“鱠”，生鱼，生肉也。汪老提到自己1947年在楼外楼吃过“醋鱼带靶”，“带靶”即是草鱼背脊上的肉剔下，切成薄片，浇上酱汁，生食。文中还提到“生吃螃蟹活吃虾”，汪老以为“醉蟹是天下第一美味”，我也举双手赞同。可惜我涓滴不饮，其中滋味肯定打了不少折扣吧。

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，瞿秋白遭叛徒出卖，千钧一发朝不保夕，是他，腾出自家寓所掩护革命家度过危难时刻；国民党残酷杀害“左联”五壮士，党组织决定突击出版《前哨·纪念死难者专号》，没有一家印刷厂敢于承印，是他，毅然组织工友秘密排版印刷；方志敏烈士的《可爱的中国》、红军集体记述的回忆录《二万五千里》等手稿辗转送到申城，还是他，冒着生命危险妥善保存革命史料，终使珍贵文献重见天日……

让人始料未及的是，做出这些英勇壮举的人士，竟是一位捧着钱庄“银饭碗”的富家公子，后来被“左联”党团书记冯雪峰誉为“不是共产党员的共产党员”“红色小开”的谢且如。

谢家世代经商，坐拥福源、福德、福康三家钱庄“连锁店”。谢且如13岁那年，父亲撒手人



(书法) 刘一闻

撤离。他又在书店二楼购置了印刷机和订书机，替中共地下党印刷宣传资料。

1935年初，革命志士方志敏在福建被捕，于狱中奋笔挥写10多万字的文稿，先后托人

千金散尽，热血酬知己

黄泽海

将《可爱的中国》《狱中纪实》《清贫》等手稿带到上海，由宋庆龄转交给冯雪峰。冯雪峰思付再三，觉得还是托付谢且如保管比较靠谱。后来陆续送交到谢且如手中的文稿，还有胡也频烈士的《秋》《故乡》，丁玲的《莎菲女士的日记》，以及红军将士撰述的宣传长征北上抗日重要意义的《二万五千里》等，他都视同生命，统统珍藏在一只小皮箱里。

“八·一三”淞沪抗战爆发，日军对闸北、南市等华界狂轰滥炸，谢且如的紫霞路老宅瞬间化作一片废墟，他从炮火中抢救出这只满载革命先辈闪光思想的小皮箱，抱着它东躲西藏，浪迹江湖。为使重要文献免遭不测，他费尽周折，耗尽积蓄，冒险将其中的部分作品编印出版。红色小册子不仅穿越法租界传遍申城，还流传到大后方的重庆与延安。

黎明前的上海滩危如累卵，局势紧张，谢且如再次担起小皮箱里手稿的命运，反复琢磨，将它们转移到夫人钱云锦的娘家。一次碰到警方搜查，钱云锦急中生智，把珍贵文稿缝进老母亲的寿衣里，总算躲过一劫。上海解放后，谢且如如释重负，他把纷乱扰攘中辛苦保存下来的革命史料，如数捐献给了国家。

其实，非常岁月里，为党组织殚精竭虑的金融家后代不胜枚举：出身青田乡绅世家、浙江实业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章乃器，为投身抗日救亡运动而辞掉“金饭碗”；孙氏“家族银行”中孚银行的继承人孙耀东，出生人死，长期为地下党充当“线人”输送情报；名门闺秀黄慕兰，以银行家身份为掩护活跃于隐秘战线，营救进步人士，打通中共海路交通线……为信仰，为承诺，为情义，他们千金散尽，挺身而出，事迹可歌可泣。

明日请看《“银联”银柜背后的较量“保联”那些事》。

